商业文明演进与晋商转型研究

崔满红摇宁振华摇康摇宁摇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阅）数据

摇晋商研究当代文库辑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郾—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圆摇摇圆
摇ISBN 陨怨苑-缘愿员园-源员苑猿-缘 郾员郾摇摇摇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孔祥毅摇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摇原梅生
编摇摇摇委：樊而峻摇郭泽光摇赵国浩摇崔满红摇王摇森
摇摇摇摇摇摇黄鉴晖摇葛贤慧摇武三林摇阎应福摇孙长青
摇摇摇摇摇摇张亚兰摇王永亮摇乔摇南摇陶宏伟
主摇摇摇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摇摇摇辑：陈摇啸摇薛秀艳摇杨志勇摇侯海燕

总摇摇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院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缘园年的历史。

员怨园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 猿园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员怨园年 缘月 圆园日第 源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 员怨园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 员怨源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员怨园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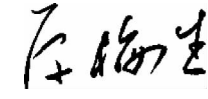
员怨员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员怨苑年 员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圆园园园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圆园园源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

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山西日报》 贰零零贰年 贰月 贰壹日、贰贰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贰零零壹年初版，壹玖玖壹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贰零零壹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贰零零贰年）、《商路漫漫五百年》（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贰零零玖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贰零零叁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柒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壹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壹玖玖壹年第 壹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壹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壹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金融研究》 壹玖玖壹年第 叁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壹玖玖叁年）、 《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 壹玖玖贰年第 贰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伍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壹玖玖陆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壹玖玖陆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了秉承学术传统，强化办学特色，开创晋商研究工作新局面，学校设立了晋商研究专项基金，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壹玖玖柒年 贰月 壹壹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摇言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成型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商人的成长和中国商业的繁荣。尤其是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的历史伟绩，称雄中国商界几百年，铸就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辉煌，对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重商立业、诚信义利、艰苦奋斗、同舟共济的晋商精神成为了中国近代商人的灵魂，生生不息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商人的成长和事业。研究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影响下的晋商转型，实际上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教训以启迪后人的事业。

《商业文明演进与晋商转型研究》一书以近代商业文明演进为背景，以晋商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在近代商业文明演进中，晋商从物贸商人向货币商人的转型和发展过程，系统分析了晋商精神和文化的形成，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较多地参考了著名晋商学者孔祥毅、张正明、黄鉴晖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明代晋商崛起的案例，都是从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中节选的。同时陶宏伟博士为本书提供了晋商转型的精选案例，在这里表示特别的感谢。

本课题由崔满红提出写作提纲，宁振华、康宁提供初稿，项目组共同修改，最后崔满红修改定稿。本课题研究中存在的瑕疵和不足以及错误均由作者负责。

作者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illegible]

目摇录

第一章摇明代晋商的崛起 …… 员

第一节摇明代经济的发展 …… 圆
第二节摇明代经济环境 …… 圆圆
第三节摇晋商崛起的直接因素 …… 猿缘
第四节摇明代晋商的意义 …… 缘远

第二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 远苑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的土地和人口状况 …… 远苑
第二节摇清代中期的手工业 …… 愿圆
第三节摇清代中期的集市发展状况 …… 怨愆
第四节摇清代中期的商业和商品流通 …… 员园员
第五节摇清代中期的邮驿制度 …… 员园缘
第六节摇清代中期的租税政策 …… 员园苑
第七节摇清代中期的货币制度与金融业 …… 员员圆
第八节摇清代中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对晋商转型的影响 …… 员员远

第三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的区域经济环境分析 …… 员猿缘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山西的土地和农业状况 …… 员猿缘
第二节摇清代中期山西的人口状况 …… 员猿苑
第三节摇清代中期山西的手工业状况 …… 员源圆
第四节摇清代中期山西商人的跨区域贸易 …… 员缘远
第五节摇清代中期的区域经济环境对晋商转型的影响 …… 员远怨

第四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的社会环境分析 …… 员源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的政治、军事环境 …… 员源
第二节摇清代中期的对外关系 …… 员怨
第三节摇清代中期的社会环境对晋商转型的影响 …… 员圆
第五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的文化环境分析 …… 员愿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的商业文明 …… 员愿
第二节摇清代中期商人的核心价值观 …… 员苑
第三节摇清代中期的社会环境对晋商转型的影响 …… 员缘
第六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的内因分析 …… 员远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晋商的物质财富与晋商转型 …… 员远
第二节摇清代中期晋商的精神财富与晋商转型 …… 员猿
第七章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及其社会影响 …… 员猿
第一节摇清代中期晋商转型综述 …… 员猿
第二节摇山西票帮的形成及发展 …… 员远
第三节摇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比较 …… 员园
第四节摇晋商转型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 员缘
第五节摇晋商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圆园缘
第六节摇晋商转型对中国商业文明的推动 …… 圆园
第七节摇山西票号衰败原因的分析和启示 …… 圆园缘
附录一摇明代晋商案例 …… 圆员苑
一、蒲州张氏与王氏家族 …… 圆员苑
二、介休范氏 …… 圆员愿
三、灵石王氏 …… 圆员怨
四、由商而官的展玉泉 …… 圆圆园
五、独辟蹊径的农商范世逵 …… 圆圆员
六、盐商祭酒杨继美 …… 圆圆猿
七、务农、做官、经商 薛氏三兄弟 …… 圆圆缘

八、雄才大略的长芦盐商王海峰 …… 圆源
九、崇尚仁德的富商李明性 …… 圆缘
十、六必居酱园店 …… 圆远
十一、广升药店 …… 圆苑

附录二摇晋商转型案例 …… 圆愿

一、晋商转型失败案例 …… 圆愿
二、晋商转型成功案例 …… 猿园

参考文献 …… 猿猿

第一章摇明代晋商的崛起

若论及年代久远的著名商人，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被范蠡尊以为师，明代晋商与之相比则默默无闻；若论及商业上的辉煌成就，清代晋商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壮举，明代晋商与之相比则暗淡无光。同时，明代又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商人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以商帮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中，明清晋商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并不能将其在两个朝代的成就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理解明代晋商的崛起，那么将无法理解清代晋商的辉煌成就。

但是，相对于清代晋商而言，考察明代晋商是一件更为困难的工作。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加拿大人卜正明（[illegible]）是一位明代社会史领域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他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序言中写道："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看法也许会妨碍我捕捉构成那位中国人生活经历的某些细节，但它同时也替我免除了那种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而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当然，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相对于清代中期之后的商人，明代商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基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叙述中推断他们的所作所为。更何况，他们所处的明代有一个复杂而陌生的背景。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所建立的封建政权，明代中期展现的商品经济大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商品经济所面临的阻力依然巨大。无论我们是否将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复杂的变化都需要仔细考量。所以，面对复杂的背景和迫不得已的推断，我们同样是明代晋商的陌生人。例如，在《明代的漕运》中黄仁宇这样写道："有关明代商业情况的资料非常缺乏。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只能以文人－官僚的记述为资料进行研究。而这些文人－官僚，由于对私有事业持悲观的看法，因而认为这个问题庸俗、低下，不值得记述。而商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一生致力于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他们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为自己'赢得'了应该得

到的厌恶和蔑视。随着这种思想观念的流行，商业对社会发展来说就不过是一种附属物。”[①] 由此可见，面对明代晋商，“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始终存在。明代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独特的，既超越了前朝又明显区别于随后的清代。同时，他们得以做出决定的思考方式也紧密嵌入这样的社会背景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尽力去还原当时的复杂背景，而不能以沾染其他时段的思维方式去贸然揣测。

本章的工作正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努力还原当时复杂的背景，对明代的晋商做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描绘。第一节是明代经济的发展，通过与之前朝代的对比来描绘明代经济所取得的新成就。第二节是明代经济环境，通过描述明代整个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因素来为分析明代商人的活动提供一个背景。第三节是晋商崛起的直接因素，通过具体分析考察山西地区的因素来分析山西商人的崛起。第四节是明代晋商的意义，通过“商帮”这个视角来理解明代晋商的意义。

第一节摇明代经济的发展

明代的经济发展超越了前朝，无论是在农业、商业以及手工业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个广泛的看法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在明代。尽管以资本主义萌芽的方式来断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不妥之处，却仍然可以肯定明代的商品生产超出了之前朝代自然经济的范畴，并且明代整个社会形态深受商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明代的商人，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随着商帮的兴起，明代商人以群体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历史性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文明的整体展现。在本节中，将着重探讨明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是如何促进了社会和商人群体的改变。

① ［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illegible]年。

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明初经济的迅速恢复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有句古话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统一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个朝代的更替有各自特殊的情况，需要仔细考察两个朝代间的联系。在元代向明代的转换过程中，由于元代统治集团的特殊性以及元末战争的惨烈，使得明初可以看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全新起点。这表现在元末战乱对经济的空前破坏以及明初经济的迅速恢复。这样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过程中较少考虑元代的影响，从而将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研究的开始。这样的便利并不总是存在的。在本章之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与清代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就导致研究明代经济史必须延续至清代初期，而不能以朝代更替为准划出一条准确的分隔线。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illegible]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建立了延续[illegible]年的明朝（[illegible]~[illegible]年）。由于元末的连年混战，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洪武二十六年（[illegible]年），全国的人口数达到[illegible]，户数达到[illegible]①这一数字超过了元代鼎盛时期。洪武二十六年（[illegible]年），全国征收的米麦豆粟计[illegible]石，②这一数字超过了元代岁入粮数（[illegible]石③）的[illegible]倍。这两个重要的数据说明，经过短短[illegible]多年的发展，明代的经济从整体上而言已经恢复到了较高水准。如此迅速的经济恢复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元末战乱对经济的破坏非常严重，明代是从一个较低的起点进行发展的；二是明初实行了有效的政策，保证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超越了元代。总之，明初经济如此迅速的恢复，为之后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在明代中期产生较大商人集团的基本条件。

---

① 《明史》卷[illegible]，《食货志》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illegible]

③ 《元史》卷[illegible]，《食货志》。

（一）元末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比较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元代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由于元代统治者始终坚持外族统治格局，其本身就存在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之后在元末的混战当中，社会经济又进一步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商业的发展极度依赖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混乱的年代不仅商业发展遭到破坏，原先整个社会的商业基础也往往随着动荡的社会一并消失。在元末，各方起义军与元代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以及之后各方起义军之间的混战，都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根据当时战乱的程度，可以合理地认为商人以及传承商业的群体没有办法在当时的局面下延续，更得不到发展。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随军商人，但是商业发展的基础毕竟是市井，战争只能破坏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无法真正促进其发展。对此，回顾几千年历史概莫能外，况且元代仍然由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由于这场战争是皇权之间的战争，本身具有掠夺特性，对社会的破坏性尤其明显。“明朝是从元末农民战争的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建国之初，面对的是一幅人民流离、田园荒芜的境况。洪武三年（元至正二十六年）苏琦说：‘自辛卯（元至正十一年，元顺帝年号）河南兵起，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那时，‘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北方练郡县近城之地尚多荒芜，如大同‘城郭空虚，土地荒残’，到洪武十五年（元至正二十六年），中原仍是‘久致荒芜’。不仅北方，就是江南，亦多荒芜之地。如江西瑞金人民‘亡绝过半，田多荒芜’，湖广广陵等十县‘土广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① 以上资料可以充分反映明初经济凋敝的状况。当时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耕地也大量处于荒芜的状态。在此局面下，再考虑到不同政权间的争斗，商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处于非常低的程度。

很多资料记载了战争的破坏。“据载，在朱元璋渡江之初，放任部下剽掠以为军需。太祖渡江，或亲征，或遣将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抵抗，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这里说到三种情况：第一，‘入敌境’，即可‘捎粮’；

①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illegible]年。

第二，城池‘抗拒’，攻破之时，‘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第三，‘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捎粮’、‘检刮’为何，史无明文。以意度之，‘捎粮’或即‘入敌境’，奔袭城池，顺路抢劫所过乡村粮食之意。而‘检刮’则为攻破城池，肆意剽掠，不限于粮食，随其所欲，均为搜检刮掠之物。总之，都是掠夺。”① 在元末的战争中，朱元璋出身低微而胸怀大志，从明朝建立之后的政策也可以看出其并非贪婪残暴之人。然而，由于战争的形势所迫，即使是朱元璋也必须借助掠夺的方法来保证战争的需要。以此不难推断，在元末的战争中，溃败的元朝统治者以及其余的起义军，同样只能依赖掠夺来满足战争的需要。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非常依赖的商业更是毁灭性打击。

元末的混战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完全解体。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社会回到一种原始的凋敝状态。然而，这样原始的状态又相当于一个崭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也可以摆脱正常情况下的种种牵制。所以，尽管明代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朱元璋却可以相当自由地规划自己的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人口大量减少以及土地大量抛荒，元末的战乱为社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土地问题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北方是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之苦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命徐达统率大军 [illegible]万北上中原，入山东，转河南，自此干戈不息，硝烟弥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地多荒芜，遗骸遍野’。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死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illegible]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他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当地的守土官也一再上书朝廷：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往辟。洪武三年（[illegible]年）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尔后，户部郎中刘九皋亦疏言：河北

①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illegible]年。

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①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经过元末战乱的破坏，各地区的大量耕地处于无主状态，需要政府召集移民进行耕种。所以，尽管明初整个社会经济处于非常凋敝的状态，中国历史一贯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却也因此而得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借由土地的重新分配，可以稳固足够数量的小自耕农，而这些直接负担赋役的小自耕农恰恰是整个封建王朝的财政基础。在此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结构与之前的朝代迥异。总而言之，朱元璋之所以可以在明初大手笔地完成如此众多而宏大的政策设计，与元末对社会经济的彻底破坏是不能脱离关系的。由此开始，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结构上超越了之前的朝代，并最终为商人和商人集团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初的恢复性政策

由于元末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彻底破坏，使得朱元璋可以在明初较为自由地规划自己的政策。所以，明初的恢复性政策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量”上的恢复，更表现在“质”上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大为改观。

洪武元年（[illegible]），朱元璋在《大赦天下诏》中下令：“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予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② 之后，在洪武二十八年（[illegible]）下令：“（洪武）二十七年（[illegible]）以后所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③ 在以上材料中可以发现，明初的荒地大量存在，并且无土地的游民众多。所以，在明初，国内农村土地的兼并程度很低，在恢复的过程中表现为拥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大量增加。而这样的小自耕农，正是政府赋役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尽管在之后的和平年代中土地兼并不断发生，仍然存在大量的小自耕农。

在移民垦荒方面，由于山西南部在元末的动荡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

①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illegible]年。

②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illegible]

③ 《明太祖实录》卷[illegible]

小，所以山西成为最重要的移民来源地。虽然类似的措施在之前的朝代也有先例，但明初移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人数在 缘园万以上；塞北地区，移出约 源苑万人；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 员愿万人。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则为‘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三地交界处，总计移入居民 员园园万人左右。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 圆原万人。”[①] 这样的政策是对全国耕地和人口分布的一次全面调整，不仅对明初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大批山西人离开故土，散布全国。这些最初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山西人有一部分成为日后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黄鉴晖先生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一章第五节中分析了山西的移民逃民与山西商人的关系。由于移民逃民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很难留下文字性的资料，然而在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山西如此大规模地向外迁出人口必然会对山西以及迁出的山西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些向外迁出的山西人，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长距离的迁徙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情况，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存在过的经历。在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中国传统社会，山西人有如此众多的商人漂泊在外，与这样的经历存在着相当的联系。

在经济作物的发展方面，朱元璋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鼓励农民种植麻、棉、桑、枣和漆树等经济作物，令地方官员督率农民栽种桑、麻、木棉及果树，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不种者必须出绢、麻布、棉布各一匹；将农桑种植面积作为官吏考核的主要内容。为鼓励农民多种经济作物，洪武元年（员缘愿年）颁令：凡种桑麻，‘四年始征其税’。这些政策的推行，有力地推动经济作物的种植，仅湖广布政司所属府县，洪武二十八年（员缘怨缘年）一年内所种桑、枣、柿、胡桃等树计达 愿源缘怨万株。棉花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以原来主要种植于闽、粤、江南和关、陕地区迅速推广到全国，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均普遍植棉。洪武二十五年（员缘圆圆年），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和怀庆七府的棉花丰收，产量高达 员园园万余斤。由于桑、棉的广泛种植，布帛、棉花和丝绵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部分。永乐十七年（员源缘怨年），全国共征收布帛 员园园愿苑匹，丝绵 圆原缘园苑斤，棉

①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圆园园年。

花绒 缘[illegible]斤。从这些数字可以反观当时的桑、棉的种植情况。”① 以上这段资料可以证实明初经济作物的发展。小自耕农不可能将大量的经济作物完全留于自身消费，而是必须通过交换将经济作物换成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在此情况下，经济作物的发展必然带动商品交换的盛行。在此基础上，远距离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只能依赖于商人进行。所以，明初经济作物的大发展对于商业以及商人集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明初在经济凋敝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并且在恢复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新的社会结构，为之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人家族才有可能获得连续几代人发展的机会，商人集团才有可能以整体的方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二、农业的发展

（一）明代农业的新发展

明代的治国思想延续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农业被认为是“本”，而商业被认为是“末”，所以在明代对经商的描写中经常可以看到“弃本逐末”等描述。明代的农业始终受到政府的重视，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同时也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传统的粮食种植方面，明代迅速超越了元代，并在之后随着各种农业技术和农业设施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通史》总结道：“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生产在农业经济中也逐渐发展起来。明前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明中期在劳动生产率上也有了提高。农具的改进和规模的扩大，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肥料的施用和土壤的改良，水利的兴修，双季稻的推广，水稻在北方的种植，杂粮在南方的推广，农

① 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illegible]年。

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